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金岳霖

学术思想评传

王中江 安继民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王中江 安继民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王中江, 安继民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10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戴 逸主编)

ISBN 7-5013-1524-8

I. 金… II. ①王…②安… III. ①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②哲学思想-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292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名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Jinyuelin xueshu sixiang pingzhuan

著者 王中江 安继民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6 (千字)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524-8/B·86

定价 20.00 元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孕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

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 20 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 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 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 年，留美的中国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

也逐步展开。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

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 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 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 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

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

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导 言

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中，金岳霖被认为是具有原创性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他留给我们的不是那“未生先死”的应景应时品，而是不属于某一时代可以为任何时代所分享的经典；他拒绝那些浅薄、庸俗和无根的各种各样的“说教”和“妄语”，而是精心细雕地去建置“知识范式”和博大精邃的哲学体系。他不是一个为他的时代所用同时又为他的时代所摧毁的“教化型”的时髦工匠，而是一个“体系化”的不朽的学院型哲学家。他为我们树立了哲学理性默然沉思的典范，树立了探求真知、立一家之言的典范，树立了传道授业、自我完善和超越的人格典范。

如果说金岳霖在哲学上达到了具有震撼性的“超越”，那么，这一切都依赖于他选择了哲学。但是，按照世俗的通常标准，这种选择能否说就是最“明智”的选择呢？

从直接的“实用”性上来说，“哲学”注定不配享有这样的“声名”。不管我们为此多么感到遗憾或惴惴不安。在这一方面，泰勒斯这位希腊的最早哲学家，往往是我们所征引的例子。故事记载，人们指责他的贫穷，想以此说明哲学是无用的。不愿接受这种偏见的哲学家，想通过发财来证明他研究哲学的“有益性”或哲学的“实用性”。但这是否有效，仍然令人怀疑。尽管实际上他的确发了财。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会饮篇》里，引用了出自别人之口的一句话——“无论干什么也比研究哲学强”，这表明已经有人清楚地意识到，要寻找“实用性”，可以到任何其它地方去，但就是别进“哲学”的门，以免误入最大的歧途。如果这样，“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或正当性何在呢？或者说，哲学没有“实用

性”是否就意味着它“一无所用”呢？作为集希腊哲学之大成的亚里士多德，如果不严肃地面对这种问题，肯定令人意外。事实上，他不仅直面了问题，而且为哲学的存在找到了最适切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不可能是“实用性”，毋宁说恰恰是在“实用性”之外，哲学的基础才会出现。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根本不是解决那些具体生活问题的手段。换言之，人只有在解决了具体生活要求之后，才能去从事“哲学”。“哲学”的目的，只是对“智慧”本身感兴趣，这也正好符合“哲学”一词的本意——“爱智”。哲学一开始就不提供实用的装备，它要扮演的角色只能是精神贵族和智慧皇后。

但是，在“实用性”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存在价值标准的世俗社会中，“哲学”最容易受到来自“用”的审查，其结果，“哲学”不仅被认为是没有“实用”，甚至被认为是“一无所用”（说得好听些，也不过是“高级废物”）。我们太过于注重物质实用了，它占居着我们心灵的整个空间，使我们忘记了那并非虚而不实的“精神事物”和那神秘莫测的最终根源。从满足我们的物质“实用”需要来说，“哲学”肯定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物质实用”作为唯一的需要，我们还关怀“崇高”和“神圣”，关怀“本源性”和“玄妙”，关怀“精神”和“心灵”的“充实”，“哲学”即便不是那么“有用”，但也决不是“一无所用”。庄子对“有用”与“无用”的“神悟”，至今可能还令我们惊叹。如果我们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心地中去测量事物的“用处”，我们怎能会想到所谓“无用”的事物，实际上不仅“有用”，甚至还包含着一种“大用”呢？庄子的这一观念，影响是深远的。冯友兰正是借助于此，对哲学之“用”作出了解释，认为“哲学”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夸大哲学的“用”，可能是危险的，我们不一定要说哲学一定具有“大用”，但说它“无用”肯定是不明智的，或者至少说是观念混乱的产物。那种运用“实用”的标准，去判定哲学的价

值，对于哲学来说，毫不相干。哲学从来就不追求“实用性”，而且它恰恰是要在“实用”的跑道之外，来显示其存在的尊严。

有趣的是，金岳霖早年选择的学业并不是没有“实用性”的“哲学”，而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至今仍更加被认为是具有“实用性”的“商学”。但是，这个“实用性”的商学，不久就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他毅然向它告别，然后选择了他认为是“万人敌”的政治学。看起来，“万人敌”似乎是更“实用”了，但实际上，在此，金岳霖已经触到了“空虚”（“空灵”）的边缘，离“实用”更远了。反过来说，他离哲学却更近了，只要再跨一步他就会进入“玄之又玄”的哲学殿堂。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位哲学家，事实上，他最终所选择的也就是没有“实用性”的哲学。

一旦选择了哲学，金岳霖就迷上了它。尽管这里充满着荆棘和疑窦，思想的探险有时伴随着感情上的痛苦。他并不是“唯一”对哲学最具“恋情”的人，但仍是执着于哲学的典型人物之一。他自称是“哲学动物”，这种“动物”老是想哲学，即便把他关在监牢里，他满脑子仍是哲学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对于金岳霖不仅是一种职业化的工作，而且更主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是他的生命之源。他曾说过一段可能让那些“有用的”实践家们感到愤怒但对他却是真实体验的话：

我们有些人进行哲学研究，是因为对真感兴趣。也有一些人进行哲学研究，是因为想得到安慰。许多人涉足哲学，是因为没有其它事情可干。……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它活动常常有其它打算。

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①

由此而言，不管对别人如何，“哲学”首先对金岳霖来说是极其“有用”的。

作为一个哲学家，金岳霖是高度理性化和技术化的。为了改变中国传统逻辑和认识论的薄弱意识，他深深地投入于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研究中。对他来说，困难不仅来自他缺乏特别的自然科学根基，而且来自于他半路起家。他需要一种训练有素的超脱法，同时，“哲学一超脱，就成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崎岖道路，布满技术性的问题，掌握它需要时间，需要训练，需要学究式的专一，在全部掌握之前往往会迷失方向，或者半途而废。”^② 罗素的分析方法为金岳霖提供了一条最有效的哲学方法，当然这完全依赖于他的高度自觉和纯熟运用。他沉浸于哲学问题的精细分析之中，留连忘返。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摆弄这枯燥无味的逻辑学时，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东西好玩。把那么抽象和“空洞”无物的东西与“好玩”联系起来，大概只能是那些出神地做概念游戏的哲学家才会有的心灵体验。面对一群冷冰冰的概念符号，金岳霖冷静地、津津有味地对它们进行一层又一层的分析，就像物理学家不懈地分析物质构成元素一样。他把对逻辑和知识论的研究完全变成了不夹杂任何个人情感的纯理性的活动，自外于对象，客观

① 金岳霖《序》，《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4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 金岳霖《中国哲学》，载同上书，第361页。

地审视，控制自我的浸入。他的洋洋巨著《知识论》，就是把哲学客观理性化和技术化的集中体现。因而，从知识论和逻辑学来说，金岳霖的精神旨趣，充分反映了西方哲学的特性；他之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更接近于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意义。

但是，一旦进入到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情形就有所不同。这不是说，他不再运用他那让罗素也会感到不如的得心应手的分析方法，也不是说，在实质问题上，他从西方哲学的资源中抽身离开了，而是说，他也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支撑他的形而上学的支点。就形而上学而言，显然，中国哲学也具有充分的资源可资利用，以作为重建形而上学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在形而上学领域，金岳霖所要求的已不再仅仅是理智的满足，同时，他还需要感情上的愉悦。而凝聚着传统浓厚情调的中国形而上学观念，恰恰能在此发挥外来新观念所难以替代的作用。“道”这个观念，最具象征意义。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用“逻格斯”、“理念”或者“上帝”等西方观念来替代它，但它们都难以引起中国人心灵或情感上的共鸣。因此，当有人问他何以把形而上学体裁的书，名之为《论道》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要使它有“中国味”。哲学家意味深长地说：“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的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可是，如果另立一新名目，此“新名目之所谓也许就不能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①当然，在内容上，“道”已被金岳霖赋予了某种“新”的内涵；在形式上，以“道”为核心观念的形而上学，也被编织为一种层层推演的逻辑体系。这种体系化的形而上学，改变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缺乏形式系统的不足，但在满足人的情感上是否像金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特别是，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形而上学，不管如何玄之又玄，但最终往往都要落实在“人”身上。而在金岳霖

① 金岳霖《论道·绪论》。

的形而上学中，“人”的任何优越感被连根拔起。因为“人类”使他觉得是那样地不可救药，以至于最终不得不被“道演”所淘汰。如果我们试图从这里找到使人类对“沉沦”不再麻木的契机，金岳霖的忧虑也许可以被解为是唤醒“人类”的最严重警告。但难道由此就能解除掉直接的悲观主义情调吗？“人类”固然最为麻烦，但他不是一直在寻找改变自身的良方吗？也许很难寻找到，或者根本上就没有，但我们在据有“绝望”的充分根据之前，我们不是应该继续尝试吗？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蝈蝈”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戴 逸
导 言	（ 1 ）
第一章 学思历程及其渊源	（ 1 ）
一 少年时代	（ 1 ）
二 求学域外	（ 7 ）
三 大学讲坛与哲学创建	（13）
四 学术思想转向	（25）
第二章 形而上学体系	（42）
一 哲学与形而上学	（42）
二 存在本根	（53）
三 大化流行	（63）
四 理则秩序	（72）
五 终极理想	（82）
第三章 知识论体系	（97）
一 知识论相关问题	（97）
二 知识论出发点的预设	（117）
三 知识材料的获得	（131）
四 认知与命题和真	（143）
五 归纳原则论	（165）
六 事实理论	（180）
第四章 逻辑思想	（198）
一 逻辑范畴思想	（200）
二 逻辑哲学思想	（213）

第五章 罗素哲学分析批判	(231)
一 罗素形式逻辑思想判析.....	(232)
二 罗素感觉材料论的判析.....	(252)
结束语 研究与评价	(275)
一 历史回顾.....	(275)
二 历史位置.....	(284)
附 录	(288)
金岳霖年谱简编.....	(288)
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315)
后 记	(326)